

永恒的战士

记颜金生将军

栗光祥 胡涤非 编著

解放军出版社



颜金生将军



1937年3月，在陕西同官县（今铜川市）陈炉镇与红二方面军部分同志的合影，前排右第二人为颜金生。

1949年西安解放后，一军部分干部到西安汇报工作时与贺龙等同志摄于原高桂滋公馆，第三排右第二人为颜金生。



1937年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与李贞将军合影，右为颜金生。



1958年10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时与颜金生的合影。



1959年春，在河南明港一军三师坦克团一连当兵，左第三人为颜金生。



1980年4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接见前国民党上将商震夫人及子女，颜金生（前排左起第三人）参加接见。



1976年摄于新疆军区石河子“五七”干校。

1982年春，参加北京市军民共建活动，与北京市市委书记焦若愚同志一起劳动。



1987年秋，人大常委视察首都钢铁厂，左起第二人为颜金生。



1983年，率中国人民解放军老战士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第一排左第二人为团长颜金生。



1986年，王震等老同志接见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写人员合影，前排左二为颜金生。



1986年
春在家中。



1986年参观导弹发射，前排右第一人为颜金生。

紅二方面軍在京部分老同志合影留念

一九八六年十月四日



1986年10月4日，紅二方面軍在京部分老同志合影留念，前排右起第四人為顏金生。



1988年元月，原358旅716團老政委廖漢生、楊秀山、栗光祥及716團老團長黃新廷等同志合影，左第一人為顏金生。

1962年元月，颜金生与夫人谢延泉摄于开封。



1962年元月，颜金生及家人摄于开封。



1987年夏，与小孙颜福明、二孙颜欢合影。



1975年夏与大孙子颜小鸥合影。

深切缅怀颜金生同志(代序)

廖汉生 余秋里 王尚荣 黄新廷 杨秀山

金生同志久病,前些日子,我们相继到医院探视,希望他早日康复,不料他溘然离去,我们这些长期与金生同志共同战斗、共同生活过的老战友老同事都感到十分惋惜和悲痛。

金生同志出身贫寒,参加革命前只上过3年小学,没有什么文化底子,但是,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却非常重视学习,在实际工作中自觉养成了勤奋求知、好学不倦、持之以恒的良好习惯。在党的培育下,他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从一名基层政治干部成长为我军高级将领。他一生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学习虚心,新事物接受快,工作中坚持原则,认真负责,生活艰苦朴素,严于律己,这些高尚品德和思想作风,至今让人记忆犹新。

(一)

颜金生同志1918年4月出生于湖南茶陵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旧中国的黑暗,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盘剥和欺凌,促使他12岁就参加了当地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3月,他还不满14岁便毅然参加了

红军，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伍后，他不仅作战勇敢，身先士卒，而且开始注意在实践中学习和积累经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不断增长自己的才智。1934年1月，甘泗淇同志任红六军团十八师政委时，在一次遭遇战斗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当时颜金生在该师五十三团七连任指导员，他见这位首长伤势很重，就一面派部队抗击敌人，一面主动帮助其警卫员进行抢救，先是包扎止血，而后又找来一个梯子，绑成担架，并派战士把甘泗淇同志送到后方医院去治疗。在这一过程中，颜金生不知负伤的是十八师政委。甘泗淇同志的警卫员也不认识颜金生。警卫员见他年纪小，很能干，以为是连里的通信员，后来才知道他是七连的指导员，当即很受感动。由于颜金生同志善于学习，工作中点子又多，因而很快被调到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任青年干事。当时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常分配他到部队帮助工作和检查工作，有时也分配到我们所在的部队一起行军作战，从此我们便认识了。那时的印象是他很年轻，但好学聪明，虚心向同志们请教，注意摸索和总结工作规律，许多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在长征路上没有见他来部队，后来才知道由于他体质差，连日行军作战，体力不支，在长征之中病倒了，但他以顽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跟着部队走。后来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他抱病爬雪山，过草地，和部队一起到达了陕北。

（二）

抗日战争时期，颜金生同志先后任一二〇师三五八旅

主力部队七一六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他和部队一起,深入敌后,挺进冀中,转战晋察冀,坚持晋绥抗日根据地,1943年西渡黄河保卫陕甘宁边区,1945年又东渡黄河参加大反攻。在这连续行军作战的六七年的艰苦岁月里,颜金生同志从未间断自己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一书和党的文件,经常带在身边,学而不倦。他根据上级指示和部队状况,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他和团的领导同志组织部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广大指战员,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七一六团的各项战斗任务。在战果辉煌的齐会战斗、陈庄战斗、米峪镇和田家会战斗以及百团大战中,他取得了丰富的战时政治工作经验。

1942年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他认真学习党中央规定的整风文献,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经常以文件精神对照检查自己,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特别是1943年夏,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七一六团随旅部回师陕甘宁边区,参加了大练兵和大生产运动。他运用整风精神,改进领导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开展大练兵、大生产运动,是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上提出的。毛主席当时发出“边区部队在冬季要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的号召。会议明确大练兵的目的是“提高战斗力,准备大反攻”,方针是“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尤以技术为主”,基本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

大群众相结合”。

当时三五八旅在陕西富县葫芦河一带扼守延安南大门，七一六团在张家地区。廖汉生、黄新廷等一批老同志有的从延安，有的从前方，先后回到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看望部队。我们一到营区就看到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通信员送信，腰里别着个手榴弹，走一路投一路。炊事员在河滩里挑水，拿扁担练刺杀。清晨起床号未响，操场上挤满了人，有的练投弹，有的练刺杀，有的在比武，有的在互教互学。白天练了，晚上自动继续练，投弹看不到弹着点，战士们就在弹柄上点燃细的麻绳，有的用钱丝编个小笼，安上点燃的小木炭，投掷出去曳光道道，弹着点火星点点。有的把小油灯放在操场的围墙上，练习瞄准。天转冷了，在河川燃起堆堆篝火，烈焰熊熊，加上空中交错的投弹曳光，就像农村正月十五闹灯会一样，热闹非常。这样大规模的情绪高涨的群众性练兵运动，真是空前的，我们看了非常高兴。

当我们和干部战士座谈这次练兵特点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次练兵和过去练兵大不一样。”有的说，这次练兵是毛主席号召我们准备大反攻的，所以大家特别使劲；有的说，过去练兵，只练兵，不练官，这次我们营里，营长、教导员，连长、指导员和战士一样操练，我们当战士的更应好好练；有的说，过去练兵，是上级包办，干部包教，练不好就训斥，这次练兵是发动大家下决心、订计划，开展群众性比赛，谁技术好，就请谁教，大家进步也快，情绪也高；有的后进战士说，过去练不上去常挨批评，这次是帮助我们，有进步就鼓励我们，有一技之长还可以教别人，领导上相信我们，我们更加自觉了；还有的说，这次是官教兵，兵教官，官兵互

教,你追我赶,练得腰酸背痛臂肿也无怨言,仍坚持练。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充分说明练兵方法不一样,群众情绪和练兵成绩也大不一样。

以后我们和七一六团领导同志座谈这次练兵运动的经验时,当时杨秀山同志任七一六团政委,他推荐颜金生同志先谈。颜金生同志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把毛主席号召和上级指示变为全团指战员实际行动的过程。他深有体会地说,这次练兵运动的成效,是贯彻中央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决议的结果。关键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做好“两个结合”的工作,即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不断纠正了过去练兵中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少数人包办的做法,把大练兵任务变为了群众的自觉行动。他说,“两个结合”的要点是“突破一点取得经验”,这是练兵运动的“向导”,抓住向导,树立典型,表扬先进带动中间,帮助和改造后进,运动就会不断引向深入。接着他列举发现和推广一营所谓“罗克兵”李士杰投弹 60 多米的经验,推广二营七连一排排长王志中投弹 73 米的经验和三连连长陈发刺杀的经验,还有三营的射击经验,形成群众性比、学、赶、帮、超的练兵热潮情况。颜金生同志学习和贯彻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议的亲身体会,我们听了很受启发。

从 1943 年冬到 1945 年夏,七一六团贯彻群众路线领导方法进行两次大练兵和两次大生产群众运动,成绩非常显著。如,射击命中率由 48.5% 提高到 90.25%,涌现了特等射手 200 余名;投弹由平均 25 米到平均 42 米,20 余人投 60 米以上;刺杀有 700 余人达到刺杀手标准,结合日、苏式刺杀动作创造了“空中劈刺”、“枪托打击”等动作,同时进

行了战术训练。生产平均每人开荒 20 多亩,达到了粮食、副食品自给有余,部队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负担。大练兵、大生产为七一六团参加大反攻创造了有力的条件。

1945 年夏三五八旅东渡黄河举行反攻,七一六团在山西汾阳县芦家庄伏击日军由离石柳林东撤汾阳之敌 600 余人。经一个小时激战,干脆利落全歼其先头部队步骑兵近 200 人,缴获马车 35 辆、装载电台 12 部、电话单机 18 部和大批医疗器材,涌现了一连五班副班长李海芒连续刺死 4 个日本鬼子和七连一排排长王志中在距敌 60 米处数弹投向敌群中央的英雄事迹,而且据打扫战场人员亲眼所见日军死亡人员中 60%是被我军刺刀刺死的,这充分显示了部队很强的战斗力。

(三)

1947 年冬,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攻打榆林之后,利用战斗间隙普遍进行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当时任独立第一旅副政委的颜金生同志,向王尚荣旅长主动提出带领工作组到所属部队六个连队进行试点。他根据上级的部署和三五八旅七一四团的经验,首先深入连队调查研究。他发现一些连队解放战士占全连总人数的 60%至 80%,这些战士虽然大多数出身贫苦,但因受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缺乏阶级觉悟,不少人存在“当兵吃粮”的思想,战斗中贪生怕死,违反群众纪律和阳奉阴违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针对这些情况,诉苦“三查”从哪里开始呢?有的主张先诉苦,有的主张先讲课,颜金

生同志的意见是,从解决剥削关系入手。他在连队组织大家漫谈、讨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对于这个问题,一开始有人认为是命里注定的。解放区翻身农民入伍的战士则反驳说:“过去我吃糠受苦,一天挣不来半碗米。革命后,分了20垧地,一头耕牛,生活有了保障。从前是我,现在也是我,这是命吗?”进而解剖剥削关系,探寻地主剥削奥秘时,通过算账,地主有多少地?雇几个长工?几个短工?一年收多少粮?平均每个劳动力收多少粮?再减去工资、伙食、种子、肥料……其余的就归地主不劳而获。这不劳而获就是剥削。通过算账,明白了什么是剥削之后,人们气愤地说:“地主离了贫苦农民,就得饿死。”在认识有了提高之后,引导干部、战士主动诉苦。由于大多数干部、战士出身贫苦,程度不同地受了压迫和剥削,诉苦最能激起大家对旧社会的仇恨,往往一人诉苦,全会上的人泣不成声。在这个基础上提出问题:“你是陕西人,我是绥远人,他是河北人,为什么我们一样苦?为什么各地的地主老财同样坏?”这样,唤醒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共同认识到:蒋介石是为地主阶级说话办事的,是剥削阶级的总代表,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不打倒蒋介石,穷人翻不了身!在阶级觉悟有了提高之后,进而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斗志,联系实际查工作、查经济、查领导、查纪律,对不纯分子、腐朽思想、厌战情绪开展批判斗争。通过诉苦三查,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并带动了广大干部战士普遍订立杀敌立功计划,纷纷上书请战,为取得尔后外线作战胜利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12月22日,独立一旅政治部主任杨琪良同志把这些经验向纵队和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写出了《关于九天阶级教

育主要经验初步总结》的报告。这份报告呈送党中央后，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召开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上，廖汉生代表一纵队，余秋里代表三五八旅、颜金生代表独一旅，作了诉苦三查的典型发言。毛泽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还说道：“我们从中央苏区时，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48年2月下旬，西北野战军发起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对新式整军的一次检验。这次战役，是西北野战军由内线转到外线的首次战役。在战役进行中，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全歼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及两整编师5个旅，开创了西北战场围城打援的光辉范例。

这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西北野战军在去年作战中，还只能一次最多歼灭敌人两个旅，此次宜川战役，则已能一次歼灭敌人五个旅。此次胜利如此显著，原因甚多……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个多月中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的整军运动。”再次给予了新式整军运动以极大的肯定和表彰，并在全军推广。

宜川大捷后，王尚荣、颜金生率独一旅参加了西府战役、荔北战役及冬季战役。在与胡宗南决战的扶眉战役中，独一旅俘敌4千，缴获各种火炮50多门、机枪步枪千余支，圆满完成了战役中的穿插、围歼和追击任务。

1949年2月1日起，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纵队改称军。独一旅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尚荣，颜金生任政委。扶眉战役后，二师作为第